

中东欧国家周报

【斯洛伐克外交周报】

斯洛伐克与比利时争端——约瑟夫·霍瓦内茨之死

Juraj Ondriaš

(2020年9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Wu Baiyi



【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与比利时争端——约瑟夫·霍瓦内茨之死

除了新冠疫情和欧盟预算框架谈判这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斯洛伐克政府在8月和9月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外交问题。问题缘起是斯洛伐克公民约瑟夫·霍瓦内茨（Jozef Chovanec）两年前在比利时被警察拘留期间死亡的最新消息和视频发布。虽然丑闻在8月19日被曝出，但整个9月都在不断发酵。这一事件可以被视作对新政府（3月底上台）处理双边冲突的第一次考验。

该事件的背景是：38岁的约瑟夫·霍瓦内茨是一名斯洛伐克企业家，他的业务之一是为比利时建筑项目雇佣斯洛伐克工人。2018年2月23日，霍瓦内茨在比利时沙勒罗瓦机场（Charleroi Airport）无登机牌登机，还因为选不到座位推搡空姐并拒绝下飞机。比利时机场警察以暴力行为和寻衅滋事为由逮捕了他。官方报告称，霍瓦内茨在狱中有自残行为，比如用头撞墙。当警察试图让他平静下来时，霍瓦内茨心脏病发作，被送入医院。入院后霍瓦内茨陷入昏迷，并于3天后死亡。他在狱中的行为无法解释，因为尸检未证实由酒精或毒品引起。直至2018年9月，霍瓦内茨存在精神健康问题才得到证实。霍瓦内茨的遗孀亨利埃塔（Henrieta）和家人提起诉讼，披露了他的死因。

然而，此事件变成丑闻是在事发两年半之后。2020年8月19日，比利时通讯社(Belga press agency)曝光了一段新的安全摄像头录像。视频显示，霍瓦内茨在狱中被警察施暴。这段录像由比利时《最新消息报》(Het Laatste Nieuws)发布，并于第二天被斯洛伐克媒体报道。视频证实霍瓦内茨是自己造成的伤害，但视频中也出现了警察制服他并跪在他胸口16分钟，阻碍了他呼吸的画面。一名女警察甚至为了博同事一笑，在霍瓦内茨被制服的时候行纳粹军礼。霍瓦内茨出现健康问题时，警察没有呼叫急救人员。当姗姗来迟的医疗队赶到时，一名护士说，霍瓦内茨死了也不是什么损失。最后的医检报告显示，霍瓦内茨死于呼吸道阻塞。这为警察涉嫌滥用职权提供了证据。

斯洛伐克和比利时媒体报道约瑟夫·霍瓦内茨的遭遇后，引发了民众将其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进行对比。乔治·弗洛伊德是一名非洲裔美国人，5月25日被警察杀害。当时一名警察也跪在他的胸口致使他窒息而死。乔治·弗洛伊德死亡案被视为美国种族歧视的例子，而霍瓦内茨事件被认为是西欧老欧盟成员国和2004年之后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后共产主义中欧年轻国家)之间差异的例子。尽管做出这种暗示的大多是在斯洛伐克政治边缘的非主流媒体，但斯洛伐克和其他年轻欧盟成员国的民众都有一种感觉，即：他们的国家和贫穷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经

常被视为比富裕的老成员国低一等。一些事件的发生也不时地加强了这种感觉，例如：欧盟和一些西欧成员国威胁削减对拒绝接受难民配额的国家(如斯洛伐克)的资助，以及几年前曝出的丑闻——欧盟食品生产商出口给较贫穷的年轻成员国的食物与出口给较富裕的老成员国的食物相比，质量更低且更为不健康。约瑟夫·霍瓦内茨之死正好呼应了斯洛伐克的这种看法。

这一丑闻很快在斯洛伐克政界引起轩然大波。首先是在8月21日，斯洛伐克外交部称这一事件令人震惊和不安。由于负面的舆论，斯洛伐克外交部向布鲁塞尔发出外交照会，要求比利时政府迅速、负责并最大限度地重视调查。斯洛伐克外交部长伊万·科尔乔克(Ivan Korčok)也表示了震惊。斯洛伐克总统苏珊娜·恰普托娃(Zuzana Čaputová)谴责了警察的残暴行为。斯洛伐克议会主席鲍里斯·科拉尔(Boris Kollar)的表态最为严厉，称霍瓦内茨死于非法暴行，并将他与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相提并论，暗示比利时当局试图掩盖此事。在一次采访中，科拉尔情绪激动，呼吁对相关人员进行惩罚。他还发誓要帮助瓦内茨的遗孀寻求正义，例如为她支付法律费用。总体而言，此次事件使斯洛伐克政府人员将注意力从疫情转移，并表现出代表斯洛伐克利益的强硬姿态。

与此同时，斯洛伐克反对党借此机会批评政府反应软弱、不充分并且缓慢。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一方向党（Smer-SD）的政客不仅谴责了卷入丑闻的比利时警察，还对斯洛伐克政府表示出同样程度的谴责。社会民主一方向党主席罗贝尔特·菲佐（Robert Fico）间接批评外交部长科尔乔克没有召见比利时大使并要求其作出解释。一周后（8月27日），社会民主一方向党承诺提交一份议会决议草案，谴责霍瓦内茨的遭遇并要求获得更多信息。决议不仅针对比利时当局，还针对社会民主一方向党认为反应软弱无力的斯洛伐克政府。该决议于9月2日通过。这些初始的反应表明了斯洛伐克政客之间的差异。科拉尔和菲佐通常被视为斯洛伐克政治舞台上最强烈的民粹主义的代表，科尔乔克和恰普托娃则被视为更温和和务实派的代表，反应较为低调。由于这种政治两极化，不同政治团体对政府的反应并没有体现出在国际对抗中应该有的团结。因为这在本质上是个带有人情味的事件，并且能够使公众的注意力从疫情上转移，所以斯洛伐克媒体大肆报道了这一事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从而使其成为国内政治问题。

比利时方面以疫情为由延缓调查，引起了进一步的恐慌和不信任。霍瓦内茨的遗孀和其他亲属怀疑有人试图掩盖这一事件，并要求任命新的法官和检察官。视频发布后，那名行纳粹军礼的女警察于8月20日被开除。比利时联邦

警察局副局长安德雷·德森范茨（Andre Desenfants）在第二天辞职。随后，沙勒罗瓦机场警察局局长丹尼·埃尔斯特（Danny Elst）于次日辞职。两人都是在调查进行阶段暂时辞职。斯洛伐克外交部和部长科尔乔克对这些举动表示欢迎。由于国内的批评声音不断，斯洛伐克外交部强调，调查由比利时方面负责，斯洛伐克不加干涉，但是坚决要求加快步伐。最终，正如早期菲佐建议的那样，科尔乔克在9月3日召见了比利时大使，表示对调查进展不满。总的来说，促成这些举动的主要是斯洛伐克国会议员和欧洲议会的议员，而不是倾向于尽量不采取对抗性措施的斯洛伐克政府。背后原因可能是，与上届偏民粹主义的政府经常批评西方相比，现任亲西方政府不愿与西方盟友对抗。

9月2日，比利时政府认定，没有证据表明霍瓦内茨之死应归咎于警察。一周后（9月9日），科尔乔克获得政府授权要求进行彻底调查并惩罚责任人。次日，总统恰普托娃表示了她的不满，并提出派出一位斯洛伐克的医学专家参与调查。比利时在9月16日接受了这一提议。虽然恰普托娃没有具体说明这名专家的作用，但表示这将提高斯洛伐克和比利时公众对调查的信任度。科尔乔克在9月11日对这一要求表示支持。就斯洛伐克涉入此次争端，斯洛伐

克司法部长玛丽亚·科利科娃 (Mária Kolíková) 次日与比利时司法部长进行了电话讨论。

比利时政界人士、媒体和公民的愤怒也帮助了斯洛伐克。比利时警方卷入了另一起种族主义丑闻，信誉受到损害，使得对霍瓦内茨案件的批判愈发强烈。比利时政客强行在比利时议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一名斯洛伐克外交官在场，但所有参与案件的人都否认自己负有责任。比利时前警察总长、现任欧洲刑警组织主席的凯瑟琳·德·波勒 (Catherine de Bolle) 也受到质疑。

斯洛伐克的欧洲议会成员也积极参与此事，试图将此案提交给欧洲议会。他们对官方调查报告提出质疑，并决心要让凯瑟琳·德·波勒负责。功夫不负有心人，9月14日，欧洲议会主席大卫·萨索利 (David Sassoli) 承诺将密切关注此事。斯洛伐克的欧洲议会议员强调的问题包括：警察暴行、执法中的极端主义、调查进展缓慢，以及几名提供不利于警方证词的证人没有接受审问。议员们还就这些问题致函欧盟委员会，截至9月中旬已收到7000多个签名。一周后，9月21日，科尔乔克受斯洛伐克议会之托告知欧盟委员会此次事件的发展。斯洛伐克政客显然希望欧盟能以斯洛伐克无法做到的方式对比利时施加压力。这起事件被认为是对警察暴行的反抗，这正是欧盟当前面临的问题。如果这一策略成功，也许可以削弱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和

民粹主义欧洲怀疑论者的力量，因为它表明欧盟能够对保护斯洛伐克的国家利益起到作用，并表明斯洛伐克人民与西欧人拥有平等地位。

（作者： Juraj Ondriaš; 翻译：张瑞琪；校对：陈思杨；
审核：刘绯）